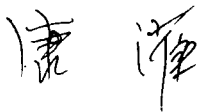


序



—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个十年的短篇小说卷，所选作品实际包括了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又经过粉碎美蒋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的胜利，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十二年的时光。这是中华民族英勇斗争、前仆后继、扭转乾坤的十二年；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翻身解放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的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总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包括短篇小说在内，应该说也和前两个十年一样，是同伟大的时代相适应，并且还是在继承五四新文学前两个十年的基础上，又有着新的不平凡的发展的。

自从“五四”以来，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运动，文学事业自也是不例外。在抗战时期，我国人民奋斗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改善人民生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是共产党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且也是为各民主党派和全体人民所接受而为之奋斗的。即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先生，但其中的有识之士及其广大士兵和公职人员也仍是目标

同人民一致。文学上更是除了周作人等个别汉奸作家和其他极少数文化特务外,当时都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连过去文坛上不与之伍的小说作家也都团结在内,他们当然都不同程度地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写作。尤其是抗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解放区各地就都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下厂”的口号,这又表现了当时的文学比之过去,同抗日、同生活的关系显然要比较贴近和直接。而更为突出的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从根本上进一步明确和发展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方向,解决了文学为谁服务,文学同生活的关系,作家同人民的关系等问题。这一“讲话”在国统区和其他地区,当然不可能像解放区一样,作家们人人自觉学习,逐步掌握和实践;但从当时整个文学的思潮来说,“讲话”的影响当然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各个地区、各个作家总都会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乃至虽然不承认而实际也已潜移默化地有所影响。特别是短篇小说比较短小精干,比较能够真实、生动、深刻和迅速地反映生活,“讲话”对其影响当然会比较显著。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十年中稍后几年的短篇小说,不少一部分确是热情澎湃地直接、间接透露了“讲话”精神的。

二

对于全民族的抗战文学,仅仅短篇小说过去已有过很多选本,其中大体都是选了两个地区的作品,这就是大后方、或称国民党统治区(即国统区)和解放区。其实热血沸腾的抗战文学并不止出现在这两个地区。我们这个选集中的作品,包括了六个地区,除国统区和解放区之外,还包括了通称的上海孤岛,即日本占领上海后所没有能够占领的上海英、法等租界;还有香港;也有东北、华北和沪、宁一带沦陷区;并有台湾。这就是说,在全民族的抗战中,除了国统区、解放区的老作家、新作家之外,就在孤岛、沦陷区和香港、台湾,也有一些老作家和新作家在那里从事直接和间接的有利于抗战的短篇小说写作。

这一短篇小说卷共收(六个地区)一百四十一位作家的一百六十五篇作品。作品的数量比作家多,是由于在原则上一人只收一篇之外,也有少数作家一人收了两篇,极少数的一人收了三篇。像老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靳以等,他们都只收了两篇。当然他们可以选上的还要多,但他们大都是三十年代以前出现的文学老前辈了,他们在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短篇小说卷中,都已选入过不少作品,因此选两篇也还比较合适。另外,像孙犁、刘白羽、路翎、萧红、骆宾基等,他们则是抗战前夕或抗战以后才出现的年轻作家,而且在第三个十年中他们的短篇小说写作相当活跃,写得比较多,较好的作品也不少,是第三个十年中读者注目的作家,因此也都选了两篇。至于选三篇的,国统区有艾芜、沙汀,解放区有丁玲、赵树理,他们都是这一个时期创作特别活跃的作家,而赵树理更是新出现的、引起广大读者十分注目的作家。其他地区,孤岛上的芦焚、王西彦,香港的萧红,也都各选了两篇。他们当时的短篇写作也比较活跃。此外,孤岛还选了柯灵等,香港还选了许地山,沦陷区选了袁犀、梁山丁、张爱玲等,台湾选了杨逵、钟理和等。至于国统区、解放区的新、老作家还多得很,大体是国统区老作家多一些,解放区则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作家。还有大诗人郭沫若也写了小说;诗人徐迟,理论家邵荃麟、黄药眠都写了小说;老作家王统照、蹇先艾、王鲁彦仍继续写作;钱钟书除长篇外也有短篇,他们的作品都已选入。现在已在美国的作家谢冰莹,她的作品也选了。并选了陈瘦竹、苏雪林、王平陵、老向等的作品。这就可以看到,短篇卷所包括的作家队伍,不只是地区广泛,在思想观点、艺术观点上甚至曾经是很不一致的作家,也都在抗日的大旗和人民解放的大旗下团结起来了。而我们的文学也正是这样同全体人民一道,从斗争中走向新中国的。

三

全民族抗战的文学,首先当然应该是正面反映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的。在新文学的前两个十年中,写战争题材的小说不少,或反映东

北抗日联军的抗战,或描写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生活,或是暴露军阀之间混战的情景,这些作品也有写得比较好的,但是真正从正面切实贴近战争生活的并不多。而抗日战争中反映军人和战地血火生活的作品,这方面的情况就有颇为重大的不同了。

抗战一开始,便有一些作家热情如火地奔赴前线,这不论在国民党部队,或是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都有。国民党中有的部队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初期,当然也进行过抗日,并且有些仗也是打得比较好的。当时跟着国民党部队上前线的姚雪垠、碧野等,就都写了正面描画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士兵和生活的短篇小说。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即是抗日时期写农民出身的战士在部队和前线的战斗生活,并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差半车麦秸”拿今天的眼光看,也许会感到作者对农民士兵的态度略有欣赏和嘲讽,但在当时确实使人感到对于农民和部队,以及战争和战地生活,实在都写得比较真切和生动,也使人耳目一新,感到欢愉,受到鼓舞,增强了抗日的热情和斗志。此外,我还记得艾芜有一篇《两个伤兵》,这里虽未选入,当时确也受人注目,因为作品确实有着中国士兵在抗日前线的血火中奋战而不怕牺牲的气息。

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也是当时引人注目之作。他还有《茅山下》等小说,写的是新四军的生活,自然又有不同的特色,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更加富于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还有写新四军生活的吴强、彭柏山的短篇,杨朔、马加写八路军生活的作品,又显得尤其深沉和厚实。再以后,孙犁的《荷花淀》、邵子南的《地雷阵》等,是写于抗战的中后期,是“讲话”发表以后,特别还是八路军、新四军战斗的解放区已经建设得有了相当规模的时候,这一时期战斗中的军民已经是全新的农民和士兵了。如果说“差半车麦秸”这个农民士兵虽也有些本能的抗日自觉,但在不少方面仍然是带有自发性的话,那么,《荷花淀》中的水生和水生嫂,以及《地雷阵》中的李勇,则已经是大不相同的新式士兵和农民了。他们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培养下,经济上政治上早已获得翻身解放,因此,他们也就有了自觉和理想,有了抗日和革命斗争的主动

性，也开始掌握了民主和文化。他们是中国全新一代的农民士兵。

在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后，由于美蒋反动派发动了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全面内战，我们又被迫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人民解放军也迅速壮大起来，战争规模已经不是抗日时期主要的游击战，而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部队的面貌、战争的面貌，当然也比抗日时期有了不小的发展。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和西虹的《英雄的父亲》就反映了这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和战争的面貌。前两个短篇是以写部队著称的老作家刘白羽的短篇代表作，也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和战争的短篇名作。这些作品中官兵的形象，又同《荷花淀》、《地雷阵》有了不小的区别。作品表现了战争的规模更大，我们部队的质量和武器装备也更先进；特别是战士和部队领导干部又都面目一新，战士在战争的空隙忆苦思甜、学政治、学文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军事民主，军官仍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但是又都有了管理和指挥大兵团的实践经验。这就使我们从文学中看到了人民解放军将要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艺术形象。

战争中的文学，当然绝不只是包括描写战斗和部队的作品，因为战争是和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密切联系着的，而第三个十年中的短篇小说，又的确有许多优秀之作并非写战争，但又同战争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全民族的抗战，既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战斗，因此抗日战争中就必须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人民才能够心情舒畅，无家庭的后顾之忧，奔向前方奋勇杀敌。我们从抗日战争的短篇小说中确也真实地看到了人民对实行民主和改善生活的要求，也看到了国民党的官僚和地主、豪绅们搞的假民主，以及他们对民主的百般阻挠、摧残和压制。这方面的代表作像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堪察加小景》，在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真压制方面，写得是多么生动和深刻。老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艾芜以及当时新出现的青年作家路翎，都有写得很好的作品。他们把国民党的腐败和人民在官僚统治下的痛苦和贫困，然而要求民主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和斗争始终不断的景象，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种不同层次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真切的反映和描写。如茅盾的《委

屈》，巴金的《某夫妇》，老舍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艾芜的《纺车复活的时候》，路翎的《何绍德被捕了》等，这方面的名篇还多得很。

关于争取民主和改善生活的斗争，解放区的作家写的就完全是另一种天地。丁玲的《夜》、《在医院中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菡子的《纠纷》，马烽的《金宝娘》等等，就都完全是新的世界、新的天地里，人民勇敢地追求和争取自身幸福与民主生活的极其生动而深切的反映。这些作品也都是当时解放区的名篇。还有束为的《红契》，这是写解放区的减租、清算和土改斗争的，其中塑造的地主并不因为是在解放区而放弃了对减租和土改的抵制，相反是十分顽强地同农民纠缠到底；但是觉醒了的农民更敢于针锋相对，并善于揭穿地主的一切花招，直至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难道不是全新的吗？

解放区是在一方面进行战争，一方面进行工农业生产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乃至人们的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建设。反映这些广泛的生活的短篇小说名篇有赵树理的《传家宝》、《福贵》，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葛洛的《卫生组长》，西戎的《喜事》，萧也牧的《货郎》，孔厥的《苦人儿》，以及李纳的《煤》。这些作品多方面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劳动、创造、生活的斗争和心灵的斗争、痛苦、欣慰、忧愁与欢乐，反映了解放区确是一个新的世界，处处都有新的人物在发芽、成长。

至于在孤岛、香港、沦陷区和台湾的作家所写的短篇，当然都不可能反映同日寇的正面斗争，但是也都直接间接地描写了敌人的残暴、旧社会的黑暗，有的也写了一些人民中美好的品德和人民对于美好事物的愿望和追求，不愿做亡国奴，要争取斗争胜利、解放，因而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作品全都间接地表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影响，和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影响。记得抗战初期曾有人提出过，可否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学；其实除了敌伪的、亡国奴的、黄色和黑色的种种不算文学的东西，当时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所写作品，哪有“与抗战无关”的呢？因而其他地区的作品也同国统区、解放区的作品一样，对于新中国的建立都是有促进的。

四

第三个十年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也有着新的发展。

老作家茅盾、巴金、老舍直到许地山、沈从文，他们有的这一时期在长篇上有突出成就，茅盾甚至还写了话剧，但是他们还坚持短篇写作，而且艺术技巧更老练更成熟，风格又各异，并仍然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特色。艾芜这一时期很多产，连过去比较难产的沙汀，这一时期也成了多产的小说家。艾芜、沙汀这一时期都可以说达到了他们创作的高峰，也达到了各自艺术特色的成熟之境。

芦焚、碧野、王西彦、萧红以及骆宾基、丰村这一时期短篇都不少，他们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们政治上追求不息，有的在全国解放前夕进入了解放区。艺术上的追求也是刻苦的。芦焚和王西彦都有短篇名篇；骆宾基细致、抒情中又含幽默。萧红在香港因病英年早逝，但在那几年她仍然在短篇创作上追求自己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发展。她的早逝是永远值得人们忆念的。

以上讲的主要是国统区的作家。从抗战一开始，有些作家为了号召全民族投入抗日战争，曾经在艺术上追求过大众化和通俗化。他们追求的渠道，有的是利用民间形式和旧形式，有人还创造过讲演文学和讲唱文学，这些形式并传到过延安和解放区文艺界；理论上当时也讨论过民间形式的问题。这方面不论理论或者是创作的追求，成功或者是不太成功，他们的努力都有积极意义。而老舍的小说从来就是比较民族化大众化的，抗战时期他在国统区，仍然在民族风格和大众化方面走在前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特别是作家的深入生活上，又进一步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抗战时期，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年轻的诗人，也出现了年轻的小说家，路翎就是小说作家的代表。路翎写工人、农民、士兵，写社会底层各方面的人物。他的短篇小说反映工农群众的比较多，描写的社会面也比较广，艺术上更追求写出人物的内心世

界。他的确写过一些好作品,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同时他也在追求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上,偏于个人的主观臆测,有的还偏于胡风所谓的疯狂性、痉挛性,使人感到这样描写出来的人物并不太像劳动人民,至少是不够真实。对路翎小说的评价,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今后也还可以讨论。

先后进入解放区的老作家也不少,他们有的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写过短篇,有的到解放区以后主要是努力于长篇写作了,比如欧阳山、陈学昭、萧军等等。但欧阳山、周立波以及柳青、草明除了长篇成就突出外,短篇也写了不少。舒群、罗烽、白朗也都有不少短篇。

到解放区最早的要数丁玲,她在抗战前夕就到了陕甘宁边区,而且一到边区她就上了前线,在部队担任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称赞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过去在北平、上海写了许多著名的短篇,最早她是写女知识分子反封建、争民主和寻求个人出路的独特而强烈的愿望,很受称道。以后她写工农的作品多了,这些作品不仅革命性较强,而且反映工农群众生活的真实性,在当时也比较突出。不过,那些作品到底还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所写,大多不一定是她的亲身经历。到解放区以后,她先在部队工作,抗战一开始,她又带领一个战地服务团,奔波于前线和后方。接着在“讲话”发表后又常去农村基层参加工作,因此这时描写工农群众的作品就和过去不同了。其真实性不仅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且还往往是身之所历,因此作品思想深刻,革命现实主义色彩强烈。她在抗战前夕,有过一个短篇《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一作品就曾帮助和吸引着国统区的青年学生毅然走向延安,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于这一个十年中所选她的作品,其中的《夜》在当时就使人看了觉得多么吃惊和深深感动。那是抗战初期,作家们写八路军和解放区的工农,主要都是在歌颂,这当然很对,而《夜》所写表面似乎有点阴暗面,其实是形象地歌颂劳动人民自觉去掉自身弱点的美好心灵。至于丁玲另一篇《我在霞村的时候》,这虽也是有过争议的作品,但所写那个被日寇侮辱过的年轻妇女,她后来的觉悟和要抗日的行动,却仍是使人同情的。丁玲充满感情地描写了她,也深入了长期受难的中国

妇女的心灵，读来使人感到深切和回味无穷。另一篇《在医院中时》是发表后受到批评的作品，今天看来作品并没多大问题，无非指出了当时解放区的工作中还有缺点，文艺作品这样写，在当时也是可以的。此外这篇作品还写了知识分子妇女本身的缺点，这也真实可信。倒可以说这个短篇在艺术上恐怕并不是丁玲很优秀之作，选进这一篇，看来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代表性。

丁玲在艺术风格和表现上的个性，在于不论描写知识妇女的苦闷、忧伤和矛盾，或是描写新旧社会工农兵的忧愁、欢乐以及曲折的斗争和胜利，总都是从情节和性格形象的结合上娓娓道来，而又纤细有致地一再透进人物的内心，有时好像有点啰嗦，实际却是把艺术感染力一层一层渗入读者的灵魂，使人悠然欣慰，怆然难受，奋而激动和怡然雀跃，以至或许个别遣词用句不太规整也会被人忽略，而显出一位语言艺术大家的特色。但是，近年来竟然有人否定丁玲的创作，把她早期写的莎菲和在延安所写并非代表作的《在医院中时》，说成是所谓真实的丁玲，而把她写工农兵的作品，特别是“讲话”发表后深入生活写出的泥土气沉实，语言也较为生动，有时还含有农民的幽默之作，反倒说成所谓概念化，说成是丁玲的失败，这才是是非颠倒。

赵树理是解放区代表性的作家，也是第三个十年中我们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是一位不年轻的新作家，《小二黑结婚》发表的时候已经三十七岁，其实他在这以前的十多年就开始写作。写过欧化式的小说，也写过评书体、章回体的小说，都没有成功，但他顽强不屈地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尽管抗日初期的解放区文艺界说他搞的只是通俗宣传，而不是文学创作，他却始终不悔。他自己是农民，也是农村知识分子，在解放区又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对中国农民有着极其深刻的了解，农村生活的根基更极其扎实，又一直同农民共患难、同忧乐。他的作品总是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反映当前农村的迫切需求，一个是由他自己发展了的民族的、大众的新形式。他自己也说他的作品是“问题小说”，这就是上述农民的需求，而不是说写一个作品就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那种简单的宣传。他的民族的、大众的新形式，一般地说，是以中国

的传统小说的写法为主,即以叙述为主,从叙述中展开描写;他总是把人物的塑造放在情节的展开之中,而不单纯地抽出一段专写人物,这样当然要在艺术表现上受到些限制,但他为了自己的创造也在所不惜。因此他的《小二黑结婚》和以后不断涌现的作品,就使人惊讶地感到是过去我们文学从未有过的、使人耳目一新的、思想深沉、人物鲜活,而又确实是新的民族化、大众化之作。感到他的作品既同我国传统小说联系密切,但又是全新的大众文学。在我们的文坛上号召要创造大众文学,要追求文学的大众化已经多年了,从五四时期提倡的“平民文学”,到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提倡的“大众文学”,虽也不断有些成绩,但确实使人感到赵树理真正在实践上解决了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他的追求是早就开始了的,而不是在“讲话”发表以后才开始,当然“讲话”又给了他以进一步的促进,因此说他是典范,是代表,难道有什么过分吗?近年来也有人否定赵树理,说他的“问题小说”就是宣传品,他的小说形式是落后的民间形式,这在上边已有驳斥。其实这也是轻视工农劳动人民,轻视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是同历史的公正和人民的爱好相违背的。

新时期以来,赵树理和山西的其他大批作家被说成是“山药蛋派”,如果这一派能够成立,那么本卷中的马烽、束为、西戎都早已被人包括在内。不过马烽、束为、西戎开始写作时都并没有看过赵树理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学习赵树理而开始写作的。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确有同赵树理相似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来自生活的底层,都追求民族化、大众化;但他们和赵树理也有不同,他们对旧社会的了解没有赵树理那么深,艺术追求的过程也没有赵树理那么曲折,同时他们三人又各有特色,总的说,他们都更充满朝气,他们笔下的新人物也显得鲜活一些。

以上是太行和晋绥解放区的作家。晋察冀解放区的突出代表之一自然要属孙犁了。孙犁生长在冀中平原,生活根基比较扎实,艺术修养相当丰厚。二十岁左右在北平谋生时就开始写作,但直到抗战后在家乡投身革命,这才在新的解放区的环境中逐步写出引人注目之作,特别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总是在人物、情节和风光描写中,不露痕迹地透视着感情,而又语言生动、隽拔,文字还往往富有诗意。他深深理解

华北农村的苦难，因此他的作品，特别是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总有若干忧伤、悒郁和愁楚；他也大量地写新的欢乐，但他作品中的欢乐也往往无形地夹有一点辛酸之处，好像是叫读者在欢乐中不要忘记了过去。孙犁也写阶级的、社会的、人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但不管事件多么重大，总都有点抒情味道。甚至写农村妇女吵架，尽管描写得很直露，但在真切中也总带有同情和原谅。也许他不太善于结构大部头的矛盾斗争复杂交织的作品，但他的短篇、中篇，哪怕是信笔写来，不管使人读了会产生怎样的情怀，都总要使人感奋。他的艺术风格，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深情中又带有浪漫色彩，带有只能是他自己的独异的特质。丁玲同志曾经告诉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她讲过：“孙犁是个风格家嘛！”这说得多么好！

孙犁的作品受到普遍的欢迎，后来的不少青年作家，都有过他的影响，本卷中选的萧也牧或多或少也算一个吧。建国前后受他影响的就更多了，以致新时期以来，又出现了以孙犁为中心的“荷花淀派”这样一种说法。作为宣扬孙犁的独特风格，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可以研究、发展的。

刘白羽是写“兵”的名家，他的作品风格也比较突出。曾经有人以为他不大注意民族化、大众化，这也未始不是一种意见，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追求。他的短篇总是比较贴近现实斗争，人物和情节不仅抒情味很浓，而且都总有一些政论性和散文化。作品热情如火，但同时像《无敌三勇士》却又把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写得细致、生动、合情、合理，因而他的追求也得到了读者的承认。

作家们大都是风格各异，自有特色，像邵子南从《地雷阵》以后的短篇，就以大众化的、传统形式的创新为特色，但他的艺术形式，又和赵树理、和山西其他作家的艺术形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比较倾向于民族传统，又带着眯眯的微笑而有所发展。周而复题材广阔，生活真切、多产而又不断突进。雷加以《帽子》为代表显得眼光广阔，但又对生活描画细致，小说还总有点散文化似的。秦兆阳的《俺们毛主席有办法》是一篇浪漫主义的喜剧，把农民对于自己领袖的传说，写得天真、幽默而又严肃

感人。

关于这一个十年艺术发展的分析,以上很明显有着偏于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倾向;由于个人的经历,也只能留下这一缺陷。

五

第三个十年的短篇小说,不论哪一个地区的,总的方面正如前边所述,是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文学,即使有的内容和新民主主义并不太适合,但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在全国人民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的旗帜下,总仍然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影响之内。这就是说:

这一个时期的作品,从内容上看,都是直接间接地要求抗日反对投降,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发国难财,要求进步反对倒退,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反共内战。这些内容不论在哪一个地区都普遍存在。当然在沦陷区还有个反对当亡国奴、反对当卖国贼的内容,这在作品中也有反映。就是说各个不同地区,都有它的不同特色,但都不可能不包括在新民主主义性质之内。至于沦陷区还有敌伪的汉奸文学,以及黄色、黑色文学,那都是人民的敌人,社会的垃圾,不在我们文学之内。

第三个十年的文学,从艺术上看,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时有一个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大致可以包括这个时期文学和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方法。当然抗日的现实主义,对于解放战争就不适用了,但是这同新的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是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一个时期的文学在艺术上主要是现实主义,表现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现实主义,其中包括新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也包括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甚至还有其他比如心理现实主义,带有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带有某些现代派影响的现实主义等等。浪漫主义也是一样,包括积极的、一般的,以及带有其他因素的浪漫主义,这从作品中都可以分别看到。

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水平最高的当然还是一些短篇大师的作品,

像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沙汀、艾芜、张天翼等等。但是，如果从不同的地区来看，则解放区的短篇，反映的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实际是新中国雏形的生活面貌，并包含了某些社会主义因素，比整个国统区的生活面貌要前进了一个阶段；同时解放区作家的创作对我们的文学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息、新的手法，甚至新的文体。总之是表现了鲜明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和多样化。一九四六年郭沫若在上海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短篇创作选辑》后，曾经极为热情、兴奋地为文写道：“这几位作家的笔力可以说突破了外边的水准，寂寞的中国创作界可以说不再寂寞了。”此“外边”即指国统区。并且解放区的作家队伍还走出了新文学前两个十年主要限于知识分子的狭隘范围，而是从本地的泥土中不断涌现和成长了一批批工农兵作家新秀。因而可以说整个解放区短篇创作的水平，比整个国统区恐怕要新一点高一点，要有所突破、超过和发展。文学总要追求创新，追求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天地，和新的艺术表现，即在内容和形式上追求新兴的、民族的、群众的、多样的艺术。我以上的判断就是由此而来，不知是否妥当。

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学术理论观点的不同，这很难免，也是我们欢迎提出来讨论的，因为讨论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有些分歧不是这样，一个是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空白论”，他们追求的是假、大、空，是篡党篡国要当太上皇，这一“空白论”不过是他们政治阴谋的工具，其反动性明明白白。另外近年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也宣传“空白论”，说“五四”以来，至今没有什么文学；他们要的是符合他们自由化的文学，和满足资产阶级腐朽愿望的所谓文学，性文学、黄色、黑色的消遣文学等等。他们当然不会满意我们革命的、进步的文学。

还有一种看法，说是什么战争阻碍了中国民主的进程和文学的发展，这实在是违背事实的谬论。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胜利。”事实正是这样，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敌人的残暴和自己的正义，实际看到了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推进民主、发展民主，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

因此抗战时期国统区人民反专制、争民主,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总是不断,而哪怕一时一地争得一点暂时的民主,获得一点生活的改善,人民的力量也就更大,否则就相反。再看解放区,为什么原来既无武装又无武器,倒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抗击了大量日寇的力量,消灭了几百万妄图消灭解放区的部队,而且取得了最后胜利呢?根本的还不是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特别是实行了民主,人民自己选举村长、县长和边区参议员,他们可以监督政府和各级干部,因此广大人民思想解放,精神舒畅,教育、文化、卫生活跃,婚姻自主,道德品质也不断有所提高。他们打击敌人不怕牺牲,建设解放区不遗余力,并把解放区建成了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中国的雏形。而我们的文学也正是在战争中上了前方,赴了火线,写了战争以及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和解放区的民主建设,写了国统区反专制、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的运动,也写了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至最后建立了新中国。同时在艺术上也有所创造,塑造了典型人物,增添了民族的、大众的、多样的新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这种种事实,不都恰恰说明正是这一个时期的战争,推进了我国人民民主的进程,也推进了人民文学的发展吗?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上面的谬论呢?原来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的调调,他们搞的民主和文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文学,他们要的所谓民主和文学恰恰都是要同人民和共产党对抗,难怪他们要感到处处有阻碍了。然而对付他们,不阻碍,行吗?

另有一种主要是针对解放区文学的看法,这就是认为解放区似乎并没有什么文学,有也只是所谓封闭的文学,或是政治宣传工具,或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概念化的东西。这些看法,显然也是十足的偏见。

说解放区文学封闭吗?当时我们住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山沟里,但是我们晋察冀就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参加成立大会的现在还在的同志,就有周而复、孙犁和我,秦兆阳没参加会,但是当时也在。我们不仅能看到延安和各解放区的书报刊

物，一个时期还能看到重庆、桂林甚至上海孤岛上的部分书报刊物。国统区和延安的文艺争论，我们也同样展开过讨论。即便是西方现代派当时的发展，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材料，并非毫无所知。至于苏联反法西斯的短篇作品，以及当时法国、英国、美国反法西斯的个别短篇作品，我们也看到过。苏联考涅楚克当时的反法西斯名剧《前线》，晋察冀都曾上演了。不久我们还都知道了海明威、斯坦培克。所有这些，对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自然都会有影响，怎么能说解放区文学是封闭的呢？更主要的是解放区文学反映的是全新的、过去未曾有过的广阔天地，是开辟和开创性的文学，这同封闭不是完全对立的吗？看来倒是持此论者自己对解放区有些封闭，对解放区的文学太不了解，自己的脑袋有点被尘封锁闭了。

解放区的文学也确有政治宣传品，这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宣传的任务而写的诗、快板、故事、歌曲、剧本和宣传画等等。这些作品作为宣传工具，帮助了人民，帮助了抗战，是有功劳的，怎么能够瞧不起，不承认呢？写这类作品的诗人和剧作家，有的战争中就牺牲了。小说作者也有牺牲的，这就是丘东平；还有蒋弼则过早病逝于太行山的战火硝烟里，他的作品都没能找到和选上。这些宣传品，孙犁和我就都写过。邵子南在战争中参加游击战，当小学教员，搞生产劳动，演戏，写小说、诗和剧本，都很活跃。却也积劳成疾，五十年代中期四十岁左右过早逝世了。他写过政治宣传品式的作品，那也是值得怀念的。他甚至把《地雷阵》也当作宣传工具，然而这不是优秀的短篇吗？

说解放区的文学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概念化的文学，这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在解放区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们写作。一九四二年以后我们接受了“讲话”，那是在我们已经深入了生活，写出了作品之后，我们感觉到创作上还有些问题，有些苦闷，有些盲目；“讲话”来了，经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也就逐步明确了一些问题，感到收获极大，而这也并不是接受了什么概念化的条条框框，却是在作家同人民的关系，以及生活观察、艺术提炼上受到教育、启发，有的甚至是开窍。同时，每个作家由于生活、艺术修养的情况不同，从“讲话”接受的启

发也就并不一样,不过“讲话”确实在思想和艺术上,对解放区的文学,从质的方面不断有所提高和突破。当然“讲话”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和缺点,但这却无以掩盖其永存不灭的光辉。其光辉首先就是鲜明地表现在那一时代作家们的优秀作品上,前述郭沫若一九四六年在文章中的评价,难道是概念化可以得到的吗?

由此可以回到前面的归结,就是说第三个十年的短篇小说,同这一时期我们国家和人民扭转乾坤的伟大功绩,是比较能够相适应的。当然也还需要从今天更高一层的人民要求和文学要求,回过头去再加思考;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比之今天的高水平,这十二年的短篇小说和整个的文学,同当时的伟大时代怕又并不太适应。因为建立新中国之前,那十二年的斗争和胜利对于人民确是太伟大了,而那一个时期我们的文学虽然出了不少好作品和大作品,但是被公认的伟大作品,现在恐怕还难以提出多少,而正是这一方面的伟大作品,历史和人民太需要了,文学也实在太需要了。现在亲身经历过这十二年斗争的老作家还不少,不过他们已八十多、七十多,至少也已六十多岁,相信他们当中必然还会出现反映这一时期的好作品,甚至伟大作品,但是,更多的伟大作品自然必须寄希望于中、青年一代,以至于我们的后代。现在我们就已看到个别三十岁左右的作家,正面地逼真地描写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斗或战役的小说写得不错,他们或是间接经历过战争,或是潜心发奋地在研究历史,他们知识丰富,起点较高,完全可以信托。因此在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忍不住还要热烈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乃至伟大的描写这一段历史的文学,不断摆在人民的面前。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九日于北京,医院中。

目 录

序	康 濯 (1)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
“新生”	张天翼 (8)
“差半车麦秸”	姚雪垠 (30)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丘东平 (42)
刘粹刚之死	萧 乾 (68)
慰劳	陈白尘 (79)
抽签	丁 行 (85)
延安有“老红鬼”吗?	王楚良 (91)
激流下	吴 强 (101)
沉淀	谷斯范 (110)
张二姑娘	陶 雄 (129)
牺牲精神	萧蔓若 (139)
牺牲	白 朗 (153)
陈国瑞先生的一群	黄药眠 (167)
么武	台静农 (182)
叉路	彭柏山 (189)
支那傻子	陈荒煤 (201)
萧连长	奚 如 (210)